



“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国际趋势与重大挑战”会议讨论记录

时间：2017年10月30日 星期一 14:00-16:30

地点：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

主持人：

杨锐，CGTN《对话杨锐》栏目主持人

讨论嘉宾：

斯特普·塔尔博特，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常驻杰出学者

约翰·艾伦，布鲁金斯学会会长

中美关系与全球治理

杨锐： 里程碑式的十九大会议于不久前闭幕，而特朗普总统将在十日内访华，您怎样看待大国政治？习近平主席在上任之初就曾说，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他也亲自前往美国参加海湖庄园会晤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您认为中美两国将会是敌人还是亦敌亦友？您对这 21 世纪最重要的两国关系有什么看法？

斯特普·塔尔博特： 中美关系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而关于全球治理，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人类在逐步建立全球治理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从 2008 年、2009 年开始，原本进步的趋势出现了倒退，在全球范围内，一体化、和平、公平和自由贸易这些趋势现在让位于相反方向的趋势，即“去一体化”。在今后我们需要在很多领域付出努力才能使原有的进步趋势重回正轨。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美国和中国不愿合作，那么这种愿景就会落空；但如果两国从即将到来的领导人会晤就开始加强合作，那么我们就还有希望。

杨锐：冷战后的国际秩序主要体现为多边主义和大国主导的地缘政治重塑，今天许多国际事件都体现了这些特点。如今我们的全球治理更多是一种去全球化的开端还是更包容的再全球化？比如相对过去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发展计划对崛起中的国家更加包容。您怎么看？

约翰·艾伦：过去几年里面大家对全球化的看法出现了一些分歧，许多人包括我个人在内，至今仍然相信全球化以及其所蕴含的价值。很多人觉得全球化就是我们人类前进的一个方向。但我也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忽视了许多人的需要，以至于全球化在一些地方遭到反对。在全球化进程和权力分享的过程中，有些国家强调自身利益，并趋向保守，抗拒全球化，比如提出“美国第一”这样口号，这些国家不希望让自己的国民参与到这种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像斯特普刚才所说的，我们必须想办法建立全球范围内的伙伴关系，而不是同盟关系，有的时候国家之间很难形成同盟关系，因为同盟必须先面对各国主权的问题。我曾代表奥巴马总统领导对抗 ISIL 的国际军事联盟，之后我会谈。我意识到，在紧急、或在有重要共同目标的情况下，国家会下意识地寻求与他国的伙伴合作。这种伙伴关系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我认为在 21 世纪，在共同应对人类社会所面临一些紧迫问题的时候，各国所展现出寻求合作的意愿是积极的。美国和中国可以成为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领导力量。这不单是指中美之间的合作，更是指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各国之间展开合作的过程中展现出领导力。我曾详细审视过“一带一路”倡议，我觉得它可能是 21 世纪重要的全球战略之一。目前美国刚刚开始形成关于“一带一路”的意见，但还未达成最终结论。对于早期对话中所展现的美国国内视“一带一路”为威胁的看法，我感到有些担忧。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正迫切地需要实现对外互联和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一带一路”倡议在很多方面回应了他们对于基础设施强烈的需求。大家在西方或者是在华盛顿会听到的质疑就是：“一带一路”倡议是否真能确保各个参与国的主权，还是说“一带一路”会通过金融手段或是通过劳工安排从而在事实上损害了各国的主权。我想这在目前还是个未知数。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一带一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美国的某些观点或对“中巴经济走廊”等战略感到担忧，但是当考虑到各国经济在各个行业对改善基础

设施建设的迫切需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如我之前所说，可能是我们在 21 世纪所能看到并且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最重要的全球战略之一。

杨锐：斯特普，您第一次来中国是 43 年前，在 1974 年和基辛格博士一起。您觉得中国这个主要经济体的演变，除了为本国利益做出贡献，是否也会对中美两国跨越太平洋的共同利益产生逐步深远的影响？我们在谈权力政治，中美双边关系被认为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关系。43 年后，中国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正在重新评估中国，包括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实际上一直是在努力地解读美国的这一态度对于亚太未来有着怎样的影响。斯特普，您也亲历了中国政治及经济的发展轨迹，您对于这一问题怎么看？

斯特普：我经常到访中国。1974 年我第一次访华是同基辛格一起，当时乘坐的是 707 飞机，那可能是他第二或第三次访华，他的第一次访华是秘密的，没有媒体报道。自此，每一次我来到中国都会惊异于 1974 年的北京和现在的北京之间的巨大反差。这实际上是一个好的征兆。现在美国和中国对双边经济关系也存在摩擦和不同的观点。美国对于双边贸易逆差存在着负面的情绪。这种情绪不仅限于美国政府和国会，而且渗透到私有部门。美国的服务业可能对中国更加友好。但是底线是这样的，那就是两国政府的最高层一直保持良好对话，这可以使双边关系回到正常的轨道。

杨锐：我们可以在四个重要领域预见到一些摩擦，这些摩擦可能成为东亚地区潜在冲突的爆发点：朝鲜半岛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中国南海问题。约翰，您认为在军事层面上，四个问题中哪个是最危险的？我们必须在哪些具体领域预防可能出现的危机？我提到了四个领域，当然也不应该忽视其他问题——比如南亚局势，比如洞朗危机之后的中印关系。

约翰：请允许我从中美关系做出一些评论。我在美国演讲时，把美中关系描述为当前以及未来对美国最为重要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应该用“4C”这样一种概念来应对中美关系——首要的 C 就是合作（Cooperation），美国和中国应该寻求一切可能的合作机会，从气候变化到国际发展、脱贫等等。第二个 C 就是竞争（Competition），我们也该预料到两个大国之间可能会有冲突和竞争，这种竞争应该通过接触和及时的对话来加以控制。第三个 C 就是潜在的对抗

(Confrontation)，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来控制对抗，从而避免第四个 C，也就是冲突 (Conflict)。中美之间曾有过冲突，结果往往是双输的，所以冲突是两个国家都不应该考虑的战略选项。我自己的观点就是，如果我们把一个国家当作敌人，那我们就真的要面对一个敌人；如果把一个国家当作朋友，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表现得更像一个合作伙伴。让我来快速地回应你说的四点：在朝鲜问题上一旦爆发冲突，两个国家都将迅速地承受巨大的痛苦。非常独特地，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中国可以通过合作来提供解决方案。另外的一些问题我想也全部都是在掌控范围内的，像印中边境冲突这样的问题属于独特的地区性领土纷争。在东亚，中国和美国是有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机会，去解决朝核危机。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地去寻求合作关系。

朝核危机如何妥善解决？

杨锐：斯特普，您认为这种“自证预言”也能够应用到朝鲜问题和无核化进程中吗？即如果你把朝鲜视为敌人的话，那它会成为敌人，如果把朝鲜视为伙伴，那么有可能就像美国对中国所做的（尼克松 1972 年来华访问、您两年后和基辛格来华访问）一样，与朝鲜建立友好关系？也许这个理念可以应用到朝鲜危机的解决，但是美国拒绝积极地接触朝鲜，与此前对中国的做法截然不同。另外，中国的王毅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曾经说：“中朝关系是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够强加我们的政策于另一方；然而与此同时，其他国家期待北京要在危机解决中发挥中流砥柱的角色。您对此怎么看？

斯特普：我觉得特朗普在他的推特中并没有遵循“艾伦主义”（艾伦：“而且很有可能他之后也不会学。”斯特普：“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推特给他，他明天早上就能读到了。”）。我希望特朗普的行为不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特别是当美国总统公开羞辱朝鲜的领导人，比如说他是“火箭人”，甚至更严重地威胁说要让朝鲜从地图上消失的时候。这些言行只会让平壤政权变得越来越危险，采取越来越冒险主义的路线。但是非常幸运的是，总统发出这种言论后，我们听到了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表达了一致的意见。他们和之前特朗普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他们俩说的意思是——好吧，所有的方案都拿出来了，前面至少三届政府也都是这么说的；但是他们还说——要尽一切可能让朝鲜危机通过外交

方式得到妥善解决。我觉得美国总统访华时机非常好，通过此次访华，特朗普能够和习主席这样令他尊敬的、且有私交的领导人进行对话。我相信他们的对话一定会涉及朝鲜问题，我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更多去倾听而不是发表意见，因为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立场要比特朗普的推特更合理一点。

逆全球化与欧洲

杨锐：全球化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比如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恐怖主义。您认为在塑造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恐怖主义有着怎样的影响？它们会不会终止全球化的进程呢？

斯特普·塔尔博特：它们的确是一种威胁，而这些问题结合在一起将会困扰我们数十年之久。这些问题之前就存在，不过现在日益严峻。从欧洲方面来看，欧洲如今正遭遇困难，即七十年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如今正在分崩离析。关于英国“脱欧”问题，相信英国也有许多人对“脱欧”感到震惊，因为他们没有预料到那些想要“脱欧”的人在公投的那一天真的占据了主导。但我个人仍心存希望，希望在英国脱离欧盟的过程中，会由于过程太过复杂而最终演变成芝诺悖论。此外，英国“脱欧”也使欧洲人觉醒，让他们了解到在欧洲其它地区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因而欧洲的领导人和社会会更加努力确保稳定并且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

其次，关于加泰罗尼亚独立事件，独立对于加泰罗尼亚而言也是个悖论。如果加泰罗尼亚在西班牙政府的允许下成功独立，那么独立后的加泰罗尼亚会孤立无援。因为欧盟之前是加泰罗尼亚地区自治的保护伞，但是欧盟的领导人现在并不愿意看到整个欧洲大陆的分裂浪潮逐步兴起。

最后，关于俄罗斯问题，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联邦在世界舞台上激进，这种激进使得欧洲的地缘政治演变得像两次世界大战之前一样紧张。俄罗斯对西方尤其是西欧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这也会使欧洲有重新联合起来行动的动机。

打击恐怖主义

杨锐：当下，伊斯兰极端主义在逐渐抬头并且扰乱了目前的世界格局，带来了普遍性的恐慌。您能不能把您在 frontline 同中东 ISIL 恐怖组织直接作战的经验应用到您对于欧洲大陆等地区日益动荡局势的分析？在您看来是恐怖主义直接威胁到了未来欧盟的一体化，还是俄罗斯以及克里米亚问题带来了这种威胁呢？

约翰·艾伦：在你的提问中有三到四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谈到俄罗斯，俄罗斯对于欧洲的分裂的影响力实际上不仅体现在了其对克里米亚地区的非法占有和对顿巴斯地区分裂主义者的支持等做法中，还体现在长期以来它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干预政策中。这些政策的目标是在欧洲政治中制造分裂，使得人们对于这些国家的民主体制逐渐失去信心，使得愤世嫉俗的情绪在自由民主国家的选民中发酵，以及使人们相信欧洲作为一体化的实体不再能充分满足欧洲人民的希望。这种战略干预政策具有网络战争和混合战争的特点，并且已有成效。

关于恐怖主义，它造成了分歧和政治极化，并在欧洲掀起了本土主义政治运动——那就是在过去几年里大量涌入欧洲国家的难民。我在欧洲待过很多年，目前我的一个主要研究项目涉及北约该如何调整来适应 21 世纪的角色。在中东，许多国家的政府倒台，内战频发并带来了严重后果，还有大量的难民涌入到了西欧。这些都激化了或者说加速了欧洲的本土主义政治运动，使得许多的欧洲国家转向国内，并逐渐对欧盟丧失信心。恐怖主义是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之一。我在海外多年的作战经历使我意识到，基地组织、阿布沙耶夫、伊斯兰祈祷团和 ISIL 这些恐怖组织实际上只是表象，其背后有更错综复杂的事情。现在世界上很多地区的人们的生存状况亟待改善。司法体制、包容性的政府、教育，人权的缺失，以及最重要的经济发展前景的缺失，迫使该地区的无数的青年人变得激进化。这种激进化影响了地区的稳定自治，使得很多青年人走入了极端主义者当中，甚至成为了恐怖分子。所以说恐怖主义其实只是一个表象。在这儿我们就要再次提到国际社会。如果想知道一些深层次的因果关系，想要了解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会成为自杀式袭击者并在那些无辜民众聚集的

地方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弹，那我们就要“游”到因果链的上游，追寻这些自杀爆炸事件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应该从国际社会的视角来了解这些人所在国家的人民的生存状况，并有义务作为一个集体来共同产生影响力，分享资源，减少这样恶性的因果关系，并改善这些国家人民生活的状况。最终，我们可以减少那些自愿成为自杀袭击者的人的数量。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终止恐怖主义，因为在多元群体中总会有人想要去摧毁其他人的生活。已经有 65 个国家愿意团结起来和 ISIL 做斗争，因此我相信我们有能力构建一个集体，并在大国的正确领导下，拿出真诚的意愿，并且将资源聚集在一起来应对这个地区出现的危机，实现地区稳定化。这样的话，虽不能完全根除恐怖主义，但可以减少它。除非我们意识到在这方面采取行动的重要性，否则我们会把恐怖主义视为结果，而非表象。但事实上，它只是一个表象。

中东问题与俄罗斯

杨锐：很多恐怖主义发端于中东地区，西方媒体也评论中东为大国的坟墓。而各国的决策者及观察家认为，俄罗斯和中国能够在中东地区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和合作关系，比如饱受战争创伤的叙利亚的战后重建问题。您觉得伊朗和俄罗斯会不会认同这样的方案？鉴于这一地区也被“一带一路”倡议所覆盖，您有没有信心中国会在重建叙利亚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斯特普·塔尔博特：我并不认为叙利亚的战后状态会持续很长时间。如果这场可怕的灾难真的可以停止，我可以想象中国、美国和欧洲都会参与到叙利亚的重建之中。但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看到为了终止这场可怕的战争，已经有几种不同的战略被提出，但却并没有战略能奏效。

毫无疑问，阿萨德总统需要对叙利亚现在的情况负责。我认为，俄罗斯对叙利亚战争的干预所造成的一个问题，是使得阿萨德总统得以继续掌权，而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就难以实现。此外，您谈到了俄罗斯政策和伊朗政策之间的权宜之计，我认为这本身对俄罗斯而言是有不利影响的。虽然俄罗斯主要是一个斯拉夫国家，但俄罗斯也有一部分国民在文化和历史上有穆斯林背景，而且这些人几乎都是逊尼派。而俄罗斯却选择在中东问题上站在什叶派的一方。约翰可以告诉您更多关于俄罗斯在中东问题的立场、为什么这个立场十分糟糕以

及为什么美国在中东问题上努力不去倾向于任何一派。俄罗斯联邦内，尤其是高加索地区内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正在增长，而这正是因为大马士革、莫斯科和德黑兰形成了所谓“轴心”。

最后，我个人从始至终都是我们上届总统奥巴马先生的忠实崇拜者，我敬佩他所做的许多事情，但没有人是完美的。我的确认为，奥巴马政府执政时期的美国正在从这个世界最问题重重且极其重要的地区撤退。

杨锐： 奥巴马总统主张“幕后领导”，或者说，他通过设立榜样来领导世界，而不是对中东进行直接军事干预。正因如此，沙特阿拉伯指摘奥巴马总统没有在叙利亚跨越奥巴马所划定的红线、违规使用化学武器后对总统巴沙尔·阿萨德采取直接的惩罚措施。您如何看待在战后叙利亚重建问题上华盛顿和利雅得之间微妙滋长的不信任和相互猜忌情绪？同时，安卡拉的角色也不容小觑，土耳其站在了俄罗斯、伊朗那一边。我现在先不去讲库尔德独立公投问题，我想先来问一下您对土耳其动荡的局势分析，以及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所带来的遗留影响。在很多方面如您所知，奥巴马中东政策也极具争议。

约翰·艾伦： 在《大西洋月刊》中有一篇很好的文章分析了奥巴马总统的中东政策。在此，我尝试不去将它的观点简化。这篇文章说，奥巴马的本意是让中东去自己解决自身的问题。大家记得他上任时美国正处于两场战争之中，而他胜选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向投票者承诺他要让美国从两场战争泥泞中撤退。而现在留给我们以及历史学家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从伊拉克撤出得太早了。在我看来可能是的，因为我们又重返伊拉克。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在阿富汗战后的余波中耗时过多？要知道，我们刚刚授权重新进入阿富汗。我简短地评论一下。众所周知，美国在战争决胜时期的高强度作战能力是无法比拟的，但其实这些军事活动并不是美国最终赢得胜利的关键。这两场战争被称为第四阶段战役，对美国来说，战争的最终目的并非赢得战争，而是赢得和平。在不能通过战役本身来获得和平的情况下，需要确保长时间留在战争发生地做三件事：第一，确保长期安全；第二，提高该国治理能力；第三，提高该国经济能力。这三条必须同时具备，才能赢得和平。但是我们在这两个国家中都没有做到。

对于叙利亚，像斯特普所说的，我觉得短期内实现和平的可能性很渺茫。这是有诸多原因的。一些外部势力一直在对叙利亚施加影响，如来自土耳其的影响，来自俄罗斯的影响，来自巴沙尔·阿萨德的影响，或者是以沙特为首的与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针锋相对的外来势力，因而我认为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和平，我们可能会看到叙利亚进一步四分五裂，大家也会从西方、从美国听到类似的观点。我认为，美国这届政府仍在构思对叙利亚政策。我们可能会寻求在叙利亚建立一些相对安全的地区，而这将改善当地人的生活状况，从而实现战后重建。在短期内，我们可能达成不了和平协议。但我认为，现在亟需国际社会，不仅仅是西方，而是整个国际社会（中国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共同思索如何扭转叙利亚的种种悲剧和人道危机。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同时，若没有全面的政治解决，全面的战后基础设施重建将无法取得进展。叙利亚两派分化根深蒂固，造成北部五十万人死亡，一半人口流离失所，大量难民涌入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使当地的稳定受到威胁，这样的巨大创伤需要很长时间来愈合。我们必须确保尽可能对我们能帮助的那部分受难群众伸出援手。我们希望土耳其也能加入我们帮助难民，但这取决于土耳其国内的政治进程。

特朗普的执政逆境

杨锐：我曾三次采访穆沙拉夫总统、三次采访卡尔扎伊总统、两次采访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我始终关注阿富汗的战后重建，也间接地密切关注伊拉克的最近局势。您二位谈到的可聚焦于撤离战略。在军事上，作为拥有最强军事力量的美国可以轻易地赢得战争；但是，这也轻易地失去了和平。而也有人急切地希望中国参与到世界秩序的重建。但是，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很多人，都存在这样一个疑问——在世界秩序的重建这个问题上，是特朗普政府在做破坏还是中国？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面对媒体的时候，提出中国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这令很多关心中国的人士感到震惊。您怎么看待特朗普执政的逆境？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欧盟应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依靠某一个国家，这里她暗指的就是美国，对此您怎么看？

斯特普：虽然我现在离美国几千多英里，但是面对如此有经验的观众，我应该开诚布公。作为一名美国公民，我对特朗普为我们制定的一些路线感到担忧。个中理由，我能解其详，但并不苟同。特朗普实际上正带着美国从一个极为重要的世界领导位置撤出。让我们回到刚刚谈到的“**薛澜主义**”（领导力、创新、信任三要素）。特朗普肯定是一位创新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创新对美国和世界就是有利的。他绝对是一位领袖，但不幸的是他画地标界般地成为了一位“美国优先”的领袖。而这是有影响的，特别地，这个措词的历史溯源就是分裂主义。至于信任，我们最有价值的盟友——就像约翰刚刚谈到的，我这里指的是真正的盟友——不相信美国会继续恪守二战后形成的世界观、政策及策略。而二战结束后，12位美国总统（顺便说一下，恰好6位是民主党、6位是共和党）一直在延续和巩固这一传承。当特朗普先生入主白宫时，这样的传承是镌刻桌上的，而即使不说摒弃，他也是将其抛在一边。在结束回答这个问题前，我想落脚在一个相对正面的观点和希望上。特朗普先生的世界观被现实所冲击，而他身边有很多人，其中一些恰巧是将军，这些人正在校准目标，使其既符合美国利益，又可复兴全球化。

全球大趋势与中美未来合作

杨锐：让我们探讨一下未来。三大趋势将塑造人类的未来：高流动性、3D技术，以及物联网。我们实际上处在数字时代，您觉得在多大程度上我们会受到这全球大趋势的影响？您将会成为布鲁金斯学会的新会长，您对于未来的看法是什么呢？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点，您是怎么看的呢？

约翰：我想简单地来描述一下三个主要的领域，也是我在布鲁金斯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的。第一个就是国内政策。美国非常需要合理的国内政策，特朗普总统在很多方面的安排都涉及到了重要的国内问题，但在政治层面我们的两极分化十分严重。针对医疗改革、税收改革、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它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我们需要清晰的、中立的第三方声音。我认为布鲁金斯学会可以针对这些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第二个非常重要领域是，布鲁金斯学会可以帮助劝说众多国家一道为稳定中东局势做出贡献。出于多种原因，中东的稳定至关重要。中国、美国乃至全人类都可从中受益。第三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

这些大趋势。总的来说，全球共有五大趋势，其实中美在这五个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间。第一个就是经济重心的转移，历史上的经济重心已经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其实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新的经济体崛起了。联系到习主席最近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想对于这个理论的分析，将会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确中美关系该怎么走。美国要找准中美关系的一个定位，充分利用这个经济发展重大历史性机遇。我们固然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分歧，但是我认为这些分歧是可控的。第二，就是世界人口的变化。我们必须认识到大部分发达国家人口增长停滞甚至在减少，而且还在快速老龄化。在这个过程中就意味着劳动力在减少，对于医疗以及保险行业的压力在增加。在发展中国家，15到29岁的年轻人口急剧增加，如何为这些青年人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对许多治理不善的政府来说是非常重大的挑战。中国可以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实现稳定和增长发挥重要作用。第三是快速城市化。到本世纪末，全球四分之三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里，如何帮助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因为随着人口加速流入大城市，也在许多城市中心产生了巨大的贫民窟。这些贫民窟完全没有政府治理，而是被诸如恐怖组织和犯罪集团等非政府力量控制。这是我们从本世纪中期到本世纪末将要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中美可以展开合作的重要领域。第四就是技术与创新。这个领域中美之间有非常巨大的合作空间。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今天的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量子时代，我们必须思考人工智能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冲击。人工智能将如何影响人类的进步？事实上目前我们很多人对这些即将到来的改变毫无准备。最后一个，也是我最为担心的问题，就是越来越严重的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问题。在过去几年，美国一直遭受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影响。我们已经连续十年经历了“史上最炎热的夏天”，每一年的夏天都比去年夏天更热。我们必须通过能源政策和气候政策来限制化石能源使用并促进减排。如果不能立即减少人类对气候的影响，到本世纪末，子孙后代将蒙受损失。中国、美国以及国际社会都可以展现领导力，抓住这些主要趋势来采取行动。我们需要现在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然后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政策以及彼此的关系，合理分配资源。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地适应，否则我们将在很长时间内被动地应对这些问题。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美国不能轻易忘

记对伙伴，特别是中国，做出的携手解决问题的承诺。当前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我们现在只能依赖中国扛起应对气候变化的旗帜，起到领袖作用，或许有一天我们能拾起自己应承担的责任。所以，我认为这些是我们现在要共同面临的一些挑战。

杨锐：感谢您对五个领域的合作鼓舞人心的描述，但我不知道斯特普对此是否同意，比如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会承担领导职责的问题。特朗普总统使美国退出了许多国际性协定，包括 TPP、《巴黎协定》，也许也会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您认为美国和中国能在哪个最切实可行的领域携手合作，共同引导一个被大多数国家和经济体所接受的行动方向？

斯特普：约翰刚才谈到“我们”期待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我们”是指许多接受、尊重并且敬畏科学的美国人，此处的“我们”并不包括当今的美国总统。我们心情沉重，因为我们在白宫里有一位气候变化否认者，并且他还使其他气候变化否认者就任于处理气候问题的关键机构和部门。特朗普甚至还表示，气候变化是中国挑起来的一个骗局。在联邦政府层面上，我觉得我们可能在车的后座，甚至没有搭上应对气候变化的这辆车。但是美国不仅是政府的行政部门，我们还有若干治理机制。这些机制有自主权，并独立于联邦政府和白宫之外。比如，我们有许多像马萨诸塞州和加州这样的州，他们都有自己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我们还有公民社会；我们还有许多负责立法的两院议员正在为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愚民政策寻找解决方案。